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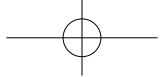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当代翻译研究视角下的中西 翻译史

翻译有着与语言一样悠久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各民族之间最重要的交际活动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职业之一。翻译跨越中西、沟通古今、穿越时空，是连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最主要的桥梁。翻译不仅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还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各国、各民族间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际手段和交往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已经天天都生活在翻译之中：我们的报章杂志天天都有许多译自外电的新闻，我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天天都在播送或放映经过翻译的外国影视作品，我们的商店天天都在出售附有译成中文的说明书或使用手册的各种进口产品，我们的读者天天都在阅读经过翻译的世界各国的文学经典、当代畅销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读物。因为有了翻译，我们才看到了舞台上说汉语的哈姆雷特，读到了用中文表述的《战争与和平》，当然与此同时，国外的读者和观众也读到了或听到了用英语哭诉的林黛玉，用德语呐喊的鲁迅，用俄语吟诵的《诗经》、《楚辞》。也因为有了翻译，中国制造的产品才会销售到世界各地，中国才可能与世界160多个国家建立起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长存都与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季羨林先生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就指出，中华文化能够长存的秘诀有两条，一是对印度文化的翻译，一是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他把这两次翻译运动分别称为“从印度来的水”和“从西方来的水”，并把中华文化比喻为一条河，有时水满，有时水少，但从未枯竭，因为有两股水注入，保持和活化其生机。¹长达1,100多年的佛经翻译，使佛教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相融合，形成了中国的佛教文化，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

1 季羨林，《季羨林谈翻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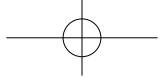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影响。同样，延续至今长达500多年的对西方科技、文学、文化的翻译，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积弱积贫的中国走向民族的自强与复兴。即使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进入经济、信息全球化的21世纪，翻译的影响和作用也没有减弱，而是愈发显著，可以说翻译在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众所周知，尽管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翻译的作用、意义、价值等长期以来却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忽视翻译的存在，看不到翻译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些现象在许多国家还依然很普遍。所以文学翻译家很难获得与作家同样的地位与尊重，非文学翻译工作者更是被看作“隐形人”，很难获得与其他专门职业者一样的社会地位。“翻译就是语言简单的转换”、“会外语就会翻译”等对翻译想当然的、粗浅的认识至今还根深蒂固。至于把翻译理论仅仅局限于应用层面，看不到它的认识层面，则不但是圈外人士这样看，甚至一些著名的翻译家也都难以超越这样的局限性。

诚然，由于翻译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际上也才只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人们对它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也是可以理解的。有鉴于此，我们希望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学员以及广大对翻译有兴趣的读者，能够通过对中西翻译史的学习与了解，深化对翻译的认识，理解翻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必然性，更新对翻译的观念，确立一个全面、科学、具有时代特征的翻译观。

第一节 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交际需求 促成了翻译的产生

翻译是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为满足交际需求而产生的语言活动。原始部落群体各自为政、自我封闭的社会形态阻碍了人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这些操不同语言的部落群体之间迫切需要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而语言不通则是影响这种跨民族交流的最大障碍。最直接、最便捷、最普遍的交际手段当然是口语交际了，这也就产生了人类最早的翻译形式——口译。不过早期的口译与现代意义的口译有很大差别。确切地说，早期的口译只能称作带有口译性质的口语交往。严格意义上的口译，是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有了正式的贸易和外交往来以后才产生的。至于笔译活动，则是在人类发明了文字以后，不同民族之间通过书面文字进行交流时才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译的历史要比笔译的历史更悠久。从不同部落群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到不同疆域、



不同民族之间商贸、文化、技艺的相互交流，从不同宗教的传播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到人类一次次的环球旅行和移民，这一切促成了翻译的诞生；反过来，人类的这些跨文化、跨民族、跨疆域的活动也大大促进了翻译的发展和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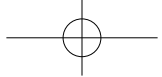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我国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有了通过“多重翻译”而进行交流的记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遥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¹ 这里记载的是越裳国派使臣来向周朝的周公赠献珍禽白孔雀。古越南越裳国（包括今越南、柬埔寨的林邑、扶南等地）在交趾之南，与中国相距遥远，语言不通，所以与中原只能通过“重译”，即多次翻译才能交流。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口译记录了，也是最早的“转接传译”（relay interpreting），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笔译始于战国时期，最早的翻译文字作品是西汉刘向在《说苑·善说》中记载的一首包括越语原文和楚语译文的《越人歌》。楚越虽是邻国，但方言不通，交往需要借助翻译的帮助。公元前528年，楚国的鄂君子皙，乘船夜游，有越女为他驾船。越女拥楫唱了一首歌，因是越语，子皙听不懂，经过翻译才明白。刘向在记存歌词的汉语译意的同时，保留了当时人们用汉字录记的越人歌唱的原音，未经翻译的《越人歌》原词为32字，翻译成楚歌后变成了54字。这首《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首译诗，它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

《圣经·旧约》上说，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希望能兴建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上帝认为这是人类虚荣心的象征，而且人们讲同样的语言，就能建起这样的巨塔，日后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呢？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决定让人世间的语言发生混乱，使人们互相之间言语不通。这个故事希望为世上出现的不同语言和种族提供解释，也被看作是引发翻译需求的事件，是翻译起源的神话，也是对翻译理论与方法进行讨论的导火线。“巴别（Babel）”这个词是巴比伦文，意思是“神之门”，而它在古希伯来语中却是“混乱”、“变乱”的意思。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灭掉犹太王国，使犹太人沦为修建巴比伦城的奴隶。亡国为奴的犹太人凭借自己的思想来表达愤怒，因此巴比伦人的“神之门”在犹太人眼里充满了罪恶，并遭到了诅咒。再加上当时巴比伦城里的居民讲的远不止一种语言，《圣经·旧约》的作者也就很容易把“语言混乱”与上帝对建塔的惩罚相联系。

西方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笔译活动之一则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250年罗马人

1 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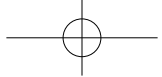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 (Livius Andronicus) 用拉丁语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距今有2,200多年。罗马在军事、政治上征服了希腊，为了把灿烂的希腊文化遗产移植过来，开始大规模地翻译希腊的典籍。正如翻译及语言教学史学家凯利 (Louis Kelly) 所言，古罗马时期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首先应当归功于翻译，因为没有翻译就没有古希腊文化在罗马的发扬光大，进而也就没有后世欧洲各民族文化的充实与发展。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翻译”、“口译”一词的含义差异很大。以拉丁语为共同先祖的英语、德语、法语和欧洲其他一些语言，被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沃尔夫 (Benjamin L. Whorf) 称为均质欧洲语 (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 Languages)， “翻译”在这些语言中的词源意义也存在差异。*translation* 源自拉丁语 *translatio*，其字面含义是 to carry over on the other side，“将……搬运到另一方”。其语义可以是 (1) 被搬运的东西 (X) 保持不变；(2) 涉及两个语境，原文语境和译文语境。被搬运的对象 (X) 从原文语境跨越边界转移到目标语境。传统上把这个边界看作是语言边界，也可能有不同的界定。X 通常指的是意义。均质欧洲语中强调跨越差异边界而保持一致、相同与相似。¹ 希腊语 *metapherein*，拉丁语 *transferre*，英语 *translate*，其隐含的认知图式是把 X 搬运走，行动者就像信使和 X 一起搬运走。德语 *übersetzen*，瑞典语 *översätta*，捷克语 *překladať*，行动者站在源头这一边，使 X 过去，X 被转移远离行动者，译成与行动者不同的另外一种语言。法语 *traduire*，意大利语 *tradurre*，西班牙语 *traducir*，俄语 *перевести*，词源上看是行动者引导 X 跨越，即是说行动者在 X 前面带路使 X 朝行动者靠近。芬兰语中“翻译”的动词形式 *kääntää*，基本意思是“翻”或“转”，译作“转变、转向”，这与均质欧洲语言差异很大，它强调差异，强调新的方向，进入一个新的语境，而不强调保持一致、维持同一性，其寓意是存在某种转变。芬兰俚语中 *kääntää* 还有“偷”的意思，翻译是一种偷盗行为，改变了所有者的身份与所属性。这让人想起译者的先祖赫尔墨斯，也是偷盗之神。²

英语中的“口译员”与“口译”来自拉丁语，其词源是“价格之间” (between prices)，源自贸易的货物交换，口译站在价格之间，确保适当的等值。这个词源强调口译的协调者角色。芬兰语中的“口译” *tulkata*，源自瑞典语 *tolk*，最初的意思是“说”、“有意义”。芬兰语与现代英语中的笔译概念与口译不同，但这两种语言都强调介入的观念，而不强调差异或相似，口译从词源上

1 Chesterman, Andrew.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Translation*. A Man of Measure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Fred Karlsson. 2005, p.5.

2 Ibid., pp.5-6.



讲就是与笔译不同的活动。¹

印欧语系中的“翻译”一词，差异也很大。现代希腊语有两个不同的术语，“翻译”*metafrazo* 就是“跨越……而说”，似乎强调差异；而“口译”*ermeneo* 就是“解释，协调”。捷克语中的“翻译”*překlada, přelořit* 表示“带过去”，强调相似性；“口译”*tlumořit* 来自阿拉伯语，强调协调。乌克兰语中的“翻译”*perekladaty* “带过去”，“口译”*tlumátsyty* 强调协调。斯洛文尼亚语 *prevajalec* 既指“翻译”也指“口译”，表示“带过去”。梵语中表示“翻译”的词有好几个，“译者”*bhāsāntarakāri* 表示另一种语言的创作者，强调差异；*Chāyānuharanam* 指“自由的翻译”，也指“模仿、反射”，强调相似性；*anuvādah* 指“跟着说”、“解释”，强调协调。“口译”*dvibhāsāvādī* 指“讲两种语言的人”，*bhāsantārāvaktā* 意思是“讲其他语言的人”，似乎强调的是差异。印地语中的“翻译”*anuvād* 指“跟着说、解释”，强调协调，“口译”*dubhāsiyā* 指“讲两种语言的人”。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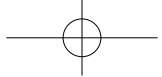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乌拉尔语系中，匈牙利语中的“翻译”*fordítani*，其字面意思“把……翻到另一面”，也是强调差异性；“口译”*tolmácsolni* 和“口译员”*tolmács* 源自小亚细亚胡里特人（Hurrite）的语言，指站在中间的协调员，把口译看作协调。阿尔泰语系中，土耳其语中的“翻译”*çevirmek* 字面意思是“改变”，也可用动词 *tercüme etmek*，它源自阿拉伯语，强调调停。日语中的“翻译”*honyaku*，*hon* 基本意思是“翻、翻转、翻飞”，*yaku* 指“替换词”；“口译”*tsuuyaku suru*，*tsuu* 指“通过、传输、交际”，其显著特征是保存相似性。韩语中的“翻译”*tong yeok hada* 与“口译”*dong si tong yeok hada* 都强调调停，*tong* 意思是“传输”、“交际”，*yeok* 指“解释”。阿拉伯语中的“翻译”与“调停、引导”接近，“翻译”*targamah*，“译员”*turguman* 借自于阿拉姆语或更早的闪族语。英语中的同源词 *dragoman* 现在还指“引导”或“口译员”，动词“翻译”*targama* 也指“写传记”。³

南亚语系中，越南语中的“翻译”与汉语同源，强调差异，*dich* 意思是“改变、转移”；*phiên-dich* 指“翻飞、颠倒、里面翻到外面”；*thông-dich* 指“洞察、理解”。“口译”*làm thông-ngôn* 强调调停。印度尼西亚语借用阿拉伯语中的“翻译”*menterjemahkan*，也使用 *manyalin*，即“复制”、“转换”，强调调停与相似。“口译”*mengalihbasakan* 指“改变语言”。泰米尔语中“翻译”与

1 Chesterman, Andrew.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Translation*. A Man of Measure Festschrift in Hon our of Fred karlsson. 2005, p.7.

2 Ibid.

3 Ibid., p.8.



“口译”使用相同的术语 *molipeyarkka*，强调差异、语言的改变。¹

汉语中的“翻译”之“翻”由“反切”之“反”引申得名。汉魏时代称“翻译”为“译”而不称“翻”，因为那时主要是外来僧人口述佛经，汉人还没有独立译经，只是参与笔受，不需要拼读梵语或西域的佛经文本，所以沿用汉以来的通称“译”，也就是不同语言之间词句和词句的直接转换。东晋出现了用“翻”来指代“翻译”，这时已有汉人自译佛经，仔细拼读字母才能得其音节词句，并用汉字来为佛经翻译中所使用的梵文、西域文字字母注音，按中国本土文化理解为“反语成字”，用汉语表示拼音的“反”来表示字母的拼读，再由此引申指代以字母拼读为特征的佛经翻译，写作“翻”，区别于中国传统的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反切”之“反”。²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学源的字书《说文解字》，把“翻”解释为“飞也”，本义是“鸟飞”，“译”解释为“传译四夷之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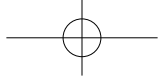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从以上“翻译”的词源可以看出，印欧语言比其他语言更强调相似性，特别是在早期的宗教典籍翻译中甚至要求一致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翻译理论中“对等”观念会起到核心作用，而要表示自由翻译时，则会使用其他术语如“改编”的原因。其次，很多语言中，“翻译”与“口译”使用不同的术语，意味着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口译”比“翻译”更强调“调停”。不同的语言对翻译观念的阐释方式也不同，并非所有的阐释都像印欧语言中那样强调保存同一性。斯特柯尼（Ubaldo Stecconi）提出翻译的符号学特征具有三方面的共性：（1）相似性：原/译文本间一定有相似关系；（2）差异性：语言不同，意义完全等同不可能；（3）调停：译者居于两者之中进行调停。³这些共性可以看作是所有翻译都具备的特性，但“翻译”一词的确切含义不是预先给定、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不证自明的，它需要在对历史上翻译过程与翻译结果的研究中去发现。因此，什么是翻译，是个历史性问题，只能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网络和权力关系来解答。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宗教典籍翻译、文学翻译与实用文献翻译的不同阶段，但翻译的根本出发点没有变，都是出于目标语文化的需求。在克服阻碍交流的语言差异的同时，翻译为交流打开了通道。多亏有了翻译，人类社会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开阔。然而人类却

1 Chesterman, Andrew.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Translation*. A Man of Measure Festschrift in Hon our of Fred karlsson. 2005, p.9.

2 傅定森，“‘翻译’词源考”，《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3期。

3 Stecconi, Ubaldo. “*Interpretive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Theory: The Semiotic Conditions to Translation*”. *Semiotica*. 2004年第150期, pp.471-489.



是在两千多年以后才明确认识到这一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图里（Gideon Toury）与德国的功能学派学者弗米尔（Hans Vermeer）才明确地提出：翻译是由目标文化发起的，是因为目标文化有所缺失，需要通过翻译来填补；¹ 翻译是在目标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产生的文本。翻译是目标文化中的事实，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事实，它形成具有自己特征的系统，归属于目标文化。由此可见，对翻译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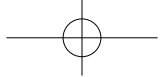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宗教典籍翻译拉开了中西翻译史的帷幕

宗教是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过程中，随着人类思维能力逐步提高而产生的。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的思维能力提高到了一定水平，能够抽象地思考比较复杂的问题。宗教产生以后，为了吸纳更多的信众，就必然需要跨越民族与国家进行广泛传播。宗教的传播，总是伴随着宗教典籍的译介展开的。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都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开来，其信众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圣经》的翻译从公元前250年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又称《旧约圣经希腊文译本》）一直持续到现在，约2,200多年的历史。佛经的翻译在我国也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所记载的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开始，兴于两晋、盛于隋唐、衰于宋代（宋代译事仅维持到政和初年即公元1111年），约1,100年的历史。² 尽管伊斯兰教反对翻译甚至宣布《古兰经》的翻译为非法，但《古兰经》的翻译从公元7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宗教典籍的翻译之所以会持续上千年，除了有广大信众的需求外，还离不开教会的赞助与支持，甚至离不开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支持。与此同时，也正是在长期大量的宗教典籍的翻译过程中，人们确立了对翻译的基本认识，包括翻译的性质、基本特征、标准、方法等。

《圣经》是世界上印数最多、发行最广、翻译语种最多的书籍，也是被联合国公认为对人类影响最大、最深的一本书。《圣经》已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包括方言，讲这些语言的人口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97%。《圣经》对西方社会的精神信仰和行为方式影响尤其巨大，与希腊神话同为打开西方精神世

1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27.

2 吕澄，《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8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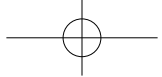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界的钥匙。西方文明深深植根于《圣经》，其价值观、政治、法律、文学、经济等方方面面无不打上《圣经》的深刻烙印。《圣经》除了是一部宗教典籍外，它本身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它的译本几乎是欧洲大多数民族语言的第一个范本。阅读《圣经》各种译本的人如此之多，甚至连研究它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圣经解释学”。

基督教传到哪个民族，《圣经》就被翻译成哪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这使得圣经翻译成为基督信仰传播与建立的一个指标。当基督教信息遇上语言难题时，圣经翻译便派上场了；当基督教的信众逐渐壮大并稳定之后，《圣经》便需要新的修订与翻译。翻译制作这些不同的版本，首先是因为《圣经》的原文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其次是各种教派众多，产生了很多非主流教派的版本；还有就是很多译本都声称自己的译本最准确，从而出现了各种名目的新译本；考古发现与圣经研究也促进新的翻译或修订版的产生；时代的变迁、语言的老化导致原有版本不适应新的读者需要，也会导致新译本的产生。时至今日，圣经翻译活动依然活跃，目前，每14天就出现一种新语言的《圣经》译本，而且是首次发行。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的古印度，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对我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语言等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佛教的创始地不是中国，但佛教典籍在全世界却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这些幸存的汉语佛教典籍不仅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为后来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佛经翻译从东汉末到宋朝，历时1,1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佛教的成熟，以及宋朝统治者对佛教政策的变化，佛经的翻译在我国逐渐走向没落。今天，虽然佛教的汉语翻译早已终结了使命，但随着佛教国际化趋势的发展，我们也许将迎来一个新的佛经翻译时代，特别是在东亚与东南亚各国，佛经翻译将有可能再次掀起高潮。

《古兰经》据传是安拉在穆圣长达23年（610-632）的传教活动中用阿拉伯文降示的一部综合性大法典，是伊斯兰信条的源泉和教法创制的依据，也是一切穆斯林行动的指南和道德规范的准则。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的多数宗教学者，尤其是出身于阿拉伯民族的学者都不主张将《古兰经》译成其他文字，并认为翻译《古兰经》是不合法的。长期以来穆斯林介绍《古兰经》的传统方式是鼓励人们直接学读原文和听取宗教学者的口头译讲，而不是靠文字译本求得其知识。然而，尽管很少得到官方的主动鼓励和支持，穆斯林研究者还是较早就开始了译经活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许多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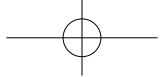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阿拉伯民族相继信奉伊斯兰教，单纯靠直接学习原文和口头译解的方式，已不能适应伊斯兰教在新信教民族中传播的需要，于是开始出现了《古兰经》的文字翻译。波斯人是继阿拉伯人之后接受伊斯兰教较早的民族，而穆斯林翻译《古兰经》可能也以波斯文为最早。他们的译文是逐行抄写或印刷在原文下面的，这不单是为了与原文对照，更主要的是为了表示译文不等于原文，只供学习参考。

“伊朗《古兰经》翻译中心”在第16届德黑兰国际《古兰经》展所做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8年，该中心从世界各国已收集到108种语言的5,000种《古兰经》全译本和选译本。这些译本中，除土耳其文译本曾被官方审定为正式本外，其他译本均被列为个人作品，只可作为他人了解或学习《古兰经》的参考，在宗教上不像《圣经》译文那样具有同原文相等的地位，只能称为“对《古兰经》阐释的翻译”、“用某某语言阐释的《古兰经》”，而不能称为“《古兰经》的翻译”。¹近年来，一些伊斯兰国际组织和信仰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部门正在设法组织人力试图靠集体协作翻译出版一些准确无误、并附有简要注解的各种文字的译本。

有西方学者指出，21世纪将是人类普遍回归宗教的世纪。此话是否正确，当然有待时间的验证，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科学、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人类对精神的需求将会逐渐增加，世界文明将打破地域与时代的隔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将会深层次地整合，互相包容，从而使人类的智慧得到质的飞跃。道德失范、心理失衡将使人们产生对抗世俗、向善向上的宗教需求，向往宗教所宣扬的那种身心放松、返璞归真的祥乐境界，从而使人类对宗教有更多的关注乃至回归。在这种情势下，宗教典籍的翻译在今后有可能会迎来又一个新的高潮。

长达2,200多年的圣经翻译、1,100多年的佛经翻译与1,300多年的《古兰经》翻译，大体上都经历了“字对字直译”-“意译”-“直译意译兼顾”的过程，这也是一个逐步认识翻译的过程。宗教译者在总结翻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翻译主张，但这些观点主要还是围绕直译与意译的翻译方法。最初的译者把宗教典籍看作是神的语言，是神的指示，有根深蒂固的“圣人之言不可违”的观念，因此为了避免翻译中的主观随意性，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字对字的直译，丝毫不顾及译语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此外，译者的外语水平、对宗教典籍的理解也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而翻译经

1 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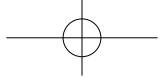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验的缺失不免导致早期译本显得生硬和不易理解，用作研究也许不无价值，但用作敬拜、公开诵读和背诵，那就难以尽如人意了。因此，后世的译者为了弥补这种直译的不足，便采取意译的方法，以思想对思想的方式来传递语篇。但意译译本在选词用字上往往会偏离原文，又包含不少译者个人的阐释，也会招致诟病。随着宗教信众的增多，阅读宗教典籍的群体层次也变得多样化，译者既要坚持不违背圣人之言，又要兼顾读者的接受程度，这就使得宗教翻译在意译的大前提下，要尽量贴近原著的语法和词句，更为灵活和自由地处理译文。

三大宗教典籍的翻译也因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古印度佛经原无写本，初期翻译主要靠外来僧人凭记忆口授。译者受中国传统宗教尤其是道家“得道成仙”观念的影响，往往以道家的哲学名词、概念来比附佛学。与《圣经》、佛教典籍不同，《古兰经》则要求对它的解释和理解必须有一定的知识框架，翻译《古兰经》必须要对经文有深入的理解，并把《古兰经》的深刻含义传达出来。然而《古兰经》的修辞、韵律等很难翻译，这就导致《古兰经》的译本注释特别多。专家们制定了评论《古兰经》的人应具有15个方面的良好修养，如语言学、句法、词法、语义学、修辞学、信仰原理、伊斯兰法学原理等，这也是翻译《古兰经》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长达数千年的宗教典籍翻译史表明，我们今天有关翻译的一些基本观念都与宗教典籍翻译有关，譬如“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的“忠实观”，“翻译中原文是第一位的，译文必须跟着它走”的“原文至上观”等等。这是因为宗教典籍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使得译者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原文。译者为了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原文，采用所谓的直译方法，有时甚至牺牲了译文的流畅性。尽管有的译者作了变通，采用“意译”的方法，但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忠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宗教典籍的翻译从来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转换，它始终都受到目标语文化的影响与制约，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操控。譬如圣经翻译，就始终是西方统治者用来统一思想、宣扬宗教、巩固权力的工具。

第三节 文学翻译丰富、深化了对翻译的认识

英语以及其他语言中的“文学”一词用来指一种特定风格、文类的创作样式，是18世纪才出现的。文学起源于以劳动为核心的多种社会实践，文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它逐步与实用性相分离，突出其审美功能，并从宗教的统治



中解放出来。综合中外论者对“文学”一词的阐释，我们知道文学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用语言来反映生活、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是以情感为中心的；它有审美价值，其语篇功能主要是用艺术的语言叙事、状物、言情，达到感染人、娱悦人、教育人的目的。文学的这些特性也是文学作品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地方。要说清楚文学是什么虽然不易，但人们却能很明确地告诉你：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是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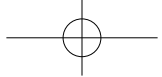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文学翻译就是把用一种语言创作的包含一定社会生活映像的文学作品尽可能完好无损地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一种社会活动，使读者在读译文时也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悟、感动和美的享受。一部文学翻译作品不但是原作者精神活动的产物，也是译者精神活动的产物。文学翻译在各个国家都享有崇高的声望，大多数的工具书和百科全书几乎都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翻译。大部分文化里提到的文学翻译指的都是优秀的、著名的译作。文学翻译概念的经典化，是主流翻译概念规范化的结果，文学翻译也因此与目标文化中其他类别的翻译区分开来。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世界三大宗教的典籍本身就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对这些典籍的翻译也成为各民族文学翻译的开端。但宗教典籍的翻译毕竟更多关注的是其传教目的，它把翻译更多的作为宣传教义的手段，甚至是政治冲突的武器，所以它和一般强调美学标准的文学翻译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宗教典籍的翻译为文学翻译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和理论认识，为文学翻译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具有不同的文学翻译观。文学翻译的作用与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对待原文和译文的态度也同样在发生变化。早期的文学翻译，翻译的目的是使外来文化归顺并融入目的语文化，丰富本国的文学系统，强调译作的美学标准，甚少关注译文对原文忠实与否，译者也不把准确传达原作的语言内涵和语义内涵作为首要的考虑。译者的自由度很大，可以创造性地使用原文，增加新词来丰富本国的语言。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个翻译高峰就是罗马人对希腊文学作品、哲学著作的翻译活动，但在翻译中罗马译者对原作随意删改，丝毫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¹

中西文学翻译史都经历了一个使用本土大众的语言来翻译文学经典的过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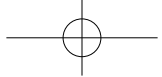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程。这种翻译趋势不仅丰富了民族语言，还提高了民族语言的地位。¹使用民族语言而非拉丁语来翻译文学作品，也成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翻译高潮。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古代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转换，以及将日常言语提炼成文学语言等，都离不开当时的文学翻译。译者为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不断发现新的文学领域，挖掘新的文化遗产，将新的思想移植到本土。他们还努力把外来语的语言结构、新的写作手法和风格引进到目的语中来，以丰富其语言结构和创作风格。文学翻译成为革新本国文学观念、引进新的文学样式、变革文学创作的主要手段。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新的创作模式，译者从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出发，对原作的内容进行删节、增添，乃至“改造”，使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本土化，这在中西文学翻译史上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

不论中外，在每一次大的文学变革之前，总要先经历一场较大的翻译活动，通过翻译引进新的写作技巧、文学意象、文学体裁，从而触发本国的文学创作，甚至开启一场新的文学革命。文学翻译把各国文学宝库中的精华“输入”到本国或“输出”到外国，对中外文学的发展与演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文学的创作疆域更加宽广，文学创作过程中融入他国特色及风格已司空见惯。美国诗歌创作从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中学到了“意象迭加”等技巧，激发了美国新诗运动意象派诗人的灵感。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所翻译的外国文学的影响。这些文学翻译者，大多也是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他们的翻译与创作互为补充、互相推动，形成了他们文学生涯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欧美现代文学的大规模翻译，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翻译打破了以往狭隘的民族领域的局限性，打破了过去那种单一的、古板的创作方式，大大扩展了文学创作的思维空间，使得各国文学在相互交流中产生了巨大效益。同时，翻译也使文学作品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通观中外文学翻译史，可以看出文学翻译往往会带有很强的目的取向。译者选取哪些作品来翻译，使用何种翻译策略，都和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学观念、以及译者本人所追求的翻译目的紧密相关。梁启超翻译政治小说，是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以服务于当时维新变法的宣传。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看中的不是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是文学所具有的功用价值，此时翻译选题的选择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学价值，而是作品的功用。²林纾

1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57.
2 王向远，“五四前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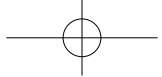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的翻译为了满足、迎合当时中国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改写原文使其更符合当时中国读者习惯的说书的叙事方式，情节生动、能调节气氛、娱悦读者，而非信实地传译西方文学。林纾的翻译造就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奇观：一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家，却翻译出了数百部外国文学作品，而且还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鲁迅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是“因为其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是由于中国需要“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其目的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来批判中国的黑暗现实，是同现实作斗争的一种手段。傅雷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希望给探宝的人作一个“即使不高明、至少还算忠实的向导”，用翻译来给予别人精神上的慰藉和帮助。

文学翻译本身的复杂性，引发了文学翻译家对自己翻译经验的理论思考，从而丰富、深化了对翻译的认识。翻译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理论问题的提出和讨论都是由文学翻译引发的，或是以文学翻译为对象的。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具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表现力，以便在深刻理解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把原作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所以文学翻译首先是一种艺术创造性的活动，要再现原作的艺术美；同时，这种创造性又是有限度的，它必须以忠实于原作为前提，被喻为“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因此，对文学翻译的认识，就不能再局限于直译与意译的层面，即除了意义的传递外，还需要考虑题材、体裁、思想、意境、风格、技巧、篇章结构、审美效果和遣词造句等，产生了诸如可译性、归化、异化、仿译、神似、化境等新的概念。此外，译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意味着对文本的创造过程，而且唯有这一过程才能使文学文本获得真正的生命。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心理结构、不同个性气质、不同审美意向和不同鉴赏定势的译者，翻译同一原文会产生不同的译文，从而折射出译者的才情与个性，产生了译者风格、译者主体性、复译、翻译批评等概念。文学翻译家不断地总结、提炼自己的翻译经验，然后把它们上升到理论层面。

随着人们对翻译性质认识的深入和文学翻译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随着文学经典名著逐步成为各国文学翻译的主要对象，译者开始逐步树立起以传递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为己任的崇高使命感，开始认识到译者既要原作者负责，对原作负责，也要对译文读者负责，体会到文学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文字的机械转换，翻译既要忠实传递原文的基本信息（故事、情节等），同时也要传递原作的审美信息，也即原作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由此，中西翻译史上树立起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学翻译观，如西方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中国严复的“信、达、雅”说等等，这些文学翻译观一直影响至今。

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起，确切地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起，随着



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摆脱了殖民者的统治并宣告独立，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经济、科技、商业等实用性文献成为翻译的主要对象，而在传统翻译史上长期居于翻译中心地位的文学翻译则逐步退出翻译的中心。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样化，文学翻译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文学翻译，不再只有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还有其他商业性质的翻译，如文学畅销书的翻译。文学翻译的生产机制、文学翻译的评判标准、文学翻译的影响等等，也都在发生新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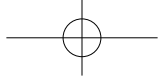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第四节 非文学翻译带来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

非文学翻译 (non-literary translation)，或称实用翻译 (practical translation)、应用翻译 (applied translation)，也称语用翻译 (pragmatic translation)，是指以传达信息为目的的一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行为 (同时考虑信息的传递效果)。它区别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国内部分学者使用的“科学翻译”，实际指的也是非文学翻译，不过显得过于偏重科技文献的翻译。此处使用的“非文学翻译”一词，涵盖范围最广，可以包括除文学以外的一切人们日常接触和实际应用的各种文本的翻译，涉及政府公文、对外宣传、科技文献、商业经贸、社会文化等有关生活、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非文学翻译都有现实的、甚至功利的目的，要求译文达到预期的功能。¹ 翻译的产生，其实也是要解决现实交际中存在的语言障碍，翻译一开始就是一种应用性的语言交际活动，翻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职业服务，一般是应客户的要求，并有一定的报酬，目的是让不掌握源语的人了解文本信息内容。²

非文学翻译的历史，与整个翻译的历史一样久远。历史上每一个帝国的形成，除了扩张领土、统治或支配众多的民族，还把原来因地理、政治、经济等因素而互相隔绝的文明地区联结起来，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帝国统治时期，必然在外交、军事、科技、法律、商贸、文化等领域存在大量的翻译活动，在客观上也就形成了一次次非文学翻译的高峰时期。波斯帝国统治时期，领土内允许以波斯语、伊朗语、巴比伦语为通用语言，由此可以推论，这些语言之间的交流必然需要以翻译作为中介。罗马帝国时期，采取了共同语言政策，即在西方各省用拉丁语，在东方各省用希腊语。

1 方梦之，《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

2 吉尔，《笔译训练指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第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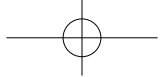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到了中古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希腊语作为通用的教学语言，在古希腊的哲学、文学和古罗马的法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拉丁语则应用在法律文献和实用技术领域。阿拉伯帝国时期，通过翻译吸收了古代希腊的医学、数学和哲学成果。从16世纪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的殖民主义时期，翻译被当作殖民压迫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为欧洲的商品开拓市场。从汉代杰出外交家张骞和班超先后出使西域，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到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对外关系活跃，且一直处于主动地位，翻译在这些对外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与欧洲国家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翻译事业的真正繁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翻译还是在二战以后才出现的，非文学翻译成为整个翻译生产的主流，并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文学翻译的繁荣，主要得益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20世纪末，计算机、互联网、通讯设备的飞跃发展，有关产品服务迅速普及，大大改变了人际沟通及信息传播的面貌。各种促销文献、技术手册、网页、以及其他各种交际形式，都需要以更快的速度、有更专业的人员翻译为更多的语种，翻译由此获得飞速的发展。翻译和语言问题在过去被认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或简单的文字转换，但随着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翻译和语言问题逐步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许多公司都把翻译提高到战略的地位，并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对其进行分析、管理以降低翻译成本，提高翻译质量，缩短翻译时间。这一切使得翻译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性产业。根据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翻译市场的调查，全世界翻译市场的规模在1999年只有104亿美元，在2003年为172亿美元，而在2005年则达到了227亿美元。¹ 翻译作为一个产业，今天的价值在于根据已有的数据创造出新的知识，将专家信息传达给潜在的、用于各自目的接受者。²

翻译工作不再是“为翻译而翻译”，即是说目标不一定是创作一个与原文对等的另一个文本，而是为解决语言障碍带来的不便，达到客户预期的效果，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完成任务，以更快的速度、更低廉的成本、更有效地汲取信息。这就使得翻译工作越来越跟先进科技产品结合，例如文本处理、数据库信息检索、电子词典、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翻译记忆工具等，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可靠性、一致性和印刷质量。像许多别的行业一样，翻译工作正在步入自动化，各种比较简单的、重复性的翻译工作（这些占了全球待译文献相当大的比例）已经可以交由机器去做，译员只需监督修改。1994年至1997年间，

1 冯志伟，《译者的电子工具·导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ix页。

2 Wilss, Wolfram.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Art. Meta*, 2004, p.784.



欧洲的翻译量增加了55%，而译员数量仅增加18%，这完全得益于电子辅助工具提高了翻译效率。¹

我国古代承担翻译工作的“象胥”、“舌人”都是政府的官员，他们在与外国使节的交往中，不仅要起到沟通语言的作用，还要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将与外国使节的对话记录下来，可以说还起到史官的作用。² 罗马帝国时期，从希腊俘虏来的奴隶成为当时的译员。从事宗教翻译的人员，主要是受过较好教育的僧侣。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大多为作家或学者。到了近现代，非文学翻译数量迅猛增长的同时，对翻译的质量与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二战之后的纽伦堡大审判、联合国的成立、欧共体的逐步发展壮大以及各种国际组织的产生，都需要大量高水平、专业的口笔译人员，才能确保各种正式交往无语言障碍的顺利进行，因此翻译的职业化时代来临了。

翻译的职业化最初是从口译开始，1919年巴黎和会是现代国际口译的转折点，从双语口译者转向经过专门技能培训的职业译员。1930年在德国曼海姆创立了第一所商业翻译学院。20世纪40年代初在日内瓦和维也纳设立的口译学校毕业的学员，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随后的联合国中得到检验。20世纪50年代初设立的国际翻译组织，如国际译联（FIT）、国际会议口译协会（AIIC），相继建立了口译的职业道德条例和职业标准。³ 1957年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了关于语言多样化的决议，各成员国都有平等使用本国语言的权利，各成员国的官方语言即成为这个组织的工作语言，随着翻译需求量的增加，笔译也逐渐成为专门的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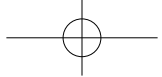
对职业翻译来说，翻译活动更多地依赖于意图、利益和权力关系，远远超出单纯的语言问题。职业译者应客户（或译文提供者）的要求而提供有偿服务，很少接触作者，译者在翻译时一般不会考虑原文的读者，却需要根据译文读者的想法来处理译文，因此客户的利益高于作者和目标读者的利益。⁴ 如广告翻译，译者除了要解决韵律、语用、句法、文本、符号等方面的难题，还需要了解基本的市场营销、目标市场的法律、文化差异对营销的影响等非语言因素，改编成为最主要的翻译策略。当前技术文本占职业翻译总量的75%，产生

1 Snell-Hornby, Mar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144.

2 Lung, Rachel & Li, Donghui. "Interpreters as Historians in China". *Meta*. 2005, pp.997-1009.

3 Pächhacker, Franz.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28-29.

4 吉尔，《笔译训练指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第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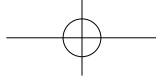


了很多新的领域，如技术写作、内容管理、多语文献、软件的本地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翻译模式，如社区口译、视频会议、手语传译、译述、摘译等；伴随而来的还有新的翻译理论问题，如对等、翻译纲要、翻译质量评估、文化移植、翻译伦理、翻译规范等。那种“像关在后面屋子里的老鼠”、起活字典作用的译者形象已经彻底改观。¹ 唯一不变的是译者能力的基本构成：对源语文本的充分理解，语言外的百科（文化）知识或专业知识，较强的目标语写作能力，翻译原则和步骤的娴熟掌握，对职场和商业运作的了解。因此，把注意力放在学生翻译语言准确性上的传统翻译教学，已无法满足市场对职业化译员的需求，新的翻译培训方法与翻译理念便产生了，如释意理论、目的论、译者行为理论等等。

市场对翻译的需求，带动了职业化的翻译教育与培训。翻译不再是只需懂一些外文，就可以随便抓起字典动手做的工作。从业人员需要接受为社会及本行业认可的正规培训，获得合格资历，并按照本行业所规定的守则与精神进行翻译工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种翻译学院相继成立，如日内瓦大学的翻译学院，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逐渐成为学术性的研究对象，采用理性的、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翻译工作和译员培训不再是一件依靠语言天才、直觉、个人经验、传统来进行的事情，译者和翻译教育者都掌握了学术研究的方法，据此来解决专业上碰到的问题。对翻译的研究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对翻译问题的关注逐渐引起了学科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各种解释翻译过程与翻译结果的理论不断产生，使翻译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尽管文学翻译只是所有翻译行为中很小的一部分，还不到1%，但中外学者讨论翻译问题时，似乎始终关注艺术性与思想性的文本，认为文学翻译在智力上更富有趣味也更具挑战性。非文学翻译涉及面广，数量巨大，文本类型各异，要求多样，更需要有针对性的理论作指导，发挥理论的对策功能。

非文学翻译与职业化翻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对它的理论思考和宗教翻译、文学翻译有很大的不同。翻译在特定社会中为特定人群的利益服务，必然受到相关社会力量的制约，也就不可能是中性的、透明的。除了翻译的语言问题，我们还需要关注翻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翻译产品如何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促进人类的交流。职业译员不仅仅是经过系统培训的双语、双文化的语言专家，更要承担起文化协调人的角色，认识到各自产品、世界观的相对性，从而尊重与对方的差异。

1 Snell-Hornby, Mar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133.



思考题

1. “翻译”的词源学含义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2. 翻译的“忠实观”是如何演变的?
3. 三大宗教典籍的翻译存在哪些差异?
4. 非文学翻译有哪些新的翻译模式?